

综述研究：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的相关研究

赵晓旭

华北理工大学心理与精神卫生学院，河北省心理健康与脑科学重点实验室，河北 唐山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30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4日；发布日期：2025年3月19日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五大人格模型(Big Five)分析了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等五个维度对冒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向性与冒险行为呈正相关，个体的外向性越高，参与高风险活动的倾向越强；而神经质则呈现复杂的双向关系，既可能抑制冒险行为，也可能通过情绪调节机制促使个体通过冒险来应对负面情绪。开放性与冒险行为呈正相关，高开放性个体更倾向于参与新颖且具有挑战性的活动；宜人性和尽责性则通常与冒险行为呈负相关，高宜人性和高尽责性的人更倾向于保守、规避高风险行为。此外，生物学机制如神经递质、激素和大脑结构也在个体的冒险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最后探讨了跨文化的影响，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冒险行为的表现和解释有所不同。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人格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跨文化、情境因素及生物学机制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

人格特质，冒险行为，五大人格模型，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生物学机制，跨文化差异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search: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Adventurous Behavior

Xiaoxu Zhao

Hebei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and Brain Science,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Received: Dec. 30th, 2024; accepted: Mar. 4th, 2025; published: Mar. 19th, 2025

文章引用: 赵晓旭(2025). 综述研究：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的相关研究. *心理学进展*, 15(3), 334-342.
DOI: 10.12677/ap.2025.153161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Openness,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on risk-taking behavior.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Extravers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isk-taking, as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Extraversion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high-risk activities. Neuroticism shows a complex dual relationship, both inhibiting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through emotional regulation mechanisms, motivating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risky behaviors to cope with negative emotions. Opennes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isk-taking behavior, with individuals high in Openness more in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novel and challenging activities.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are general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isk-taking, as individuals high in these traits tend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avoid high-risk behaviors. Additionally, biological mechanisms such as neurotransmitters, hormones, and brain structur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risk-taking decision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highlighting that risk-taking behavior is understood and expressed differently across cultur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factors such as culture, context, and biological mechanisms.

Keywords

Personality Traits, Risk-Taking Behavior, Big Five Personality Model,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Openness,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ness, Biological Mechanisms,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冒险行为是指个体在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依然选择从事高风险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可能带来身体、心理或社会上的负面后果(Yates, 1992)。冒险行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个体如何感知和处理风险，还为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从社会角度来看，冒险行为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在**公共健康领域**，冒险行为的研究可以帮助识别和干预高风险行为，如药物滥用、危险驾驶、不安全性行为等。例如，了解哪些人格特质容易导致成瘾行为，可以为设计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在**教育领域**，研究学生的冒险行为倾向有助于教育者更好地理解学生的行为模式，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教育策略，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的冒险精神，同时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此外，在**组织管理**中，识别员工的冒险行为倾向有助于优化团队配置和风险管理策略，特别是在金融、创业和高风险职业领域，理解员工的冒险倾向可以提高决策质量并降低组织风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人格特质在冒险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如何通过个体的情感、认知及生物机制的相互作用来影响他们的行为(McCrae & Costa, 2008)。人格特质是指个体在情绪反应、行为倾向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稳定模式。这些稳定的特质决定了个体如何面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如何作出决策以及如何评估风险(Robins et al., 2007)。五大人格模型(Big Five Personality Model)是人格心理学中最广泛使用的理论框架，其中包括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五个维度(Zuckerman,

2007)。这些特质不仅影响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社会互动，还与冒险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Srivastava et al., 2003)。

然而，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人格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例如，为什么某些人群更容易从事极限运动、赌博或其他高风险行为？这些行为背后有哪些潜在的生物学机制？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会影响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通过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不仅可以丰富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体系，还可以为社会政策制定和实践干预提供科学支持，从而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2. 理论框架：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五大人格模型(Big Five)是人格心理学中最为广泛接受的理论框架，其五个核心维度——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对个体的行为模式具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冒险行为领域。冒险行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其表现和动机往往与个体的人格特质密切相关。以下将结合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五大人格维度如何影响个体的冒险行为倾向。

2.1. 外向性(Extraversion)与冒险行为

外向性高的个体通常表现出积极、社交活跃和寻求刺激的行为特征。这类个体在冒险行为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倾向。研究表明，外向性与冒险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外向性个体倾向于追求新鲜刺激和社交互动，因此更容易参与高风险活动，如极限运动、赌博和冒险旅行等(Whiteside & Lynam, 2001)。这类个体对风险的容忍度较高，且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能够获得较高的情感满足感。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外向性与多巴胺系统的活性密切相关。多巴胺作为一种与奖赏和愉悦感相关的神经递质，其高水平活动可能促使外向性个体在冒险行为中体验到更多的愉悦(Lauriola & Levin, 2001)。例如，一项针对极限运动爱好者的研究发现，高外向性个体在参与高风险活动时，其多巴胺水平显著升高，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机制(Nicholson et al., 2006)。

2.2. 神经质(Neuroticism)与冒险行为

神经质高的个体通常情绪不稳定，容易体验到焦虑、愤怒和抑郁等负面情绪。神经质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呈现出双向性。一方面，高神经质个体可能因对负面情绪的敏感性而回避冒险行为，尤其是在面对高风险活动时，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保守策略(Zuckerman et al., 2000)。另一方面，研究也表明，神经质高的个体可能通过冒险行为(如赌博或药物滥用)来缓解负面情绪(Zuckerman et al., 1978)。这种情绪调节机制使得神经质在某些情境下反而成为冒险行为的驱动因素。例如，一项针对赌博行为的研究发现，高神经质个体在经历情绪压力时，更倾向于通过赌博来寻求情绪释放(Lauriola & Levin, 2001)。这表明，神经质与冒险行为的关系可能受到情绪状态和情境因素的调节。

2.3. 开放性(Openness)与冒险行为

开放性反映了个体对新经验、新思想和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开放性高的个体通常具有高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愿意探索未知领域。因此，开放性与冒险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Whiteside & Lynam, 2001)。高开放性个体更倾向于参与具有挑战性和新颖性的活动，如极限运动、冒险旅行或非传统职业选择。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接受度较高，并能够从冒险中获得成长和自我探索的满足感(Whiteside & Lynam, 2001)。例如，一项针对创业者的研究发现，高开放性个体更愿意承担商业风险，并将其视为个人成长的重要途径(Neal et al., 2012)。这表明，开放性不仅影响个体的冒险行为倾向，还可能通过冒险行为促进个人发展(De Fruyt et al., 2000)。

2.4. 宜人性(Agreeableness)与冒险行为

宜人性高的个体通常表现出合作、友好和他人导向的特征。他们更关注群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因此在决策时倾向于避免可能对他人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研究表明,宜人性与冒险行为之间通常呈负相关关系(Whiteside & Lynam, 2001)。高宜人性个体往往更加保守,倾向于规避可能引发冲突或负面后果的高风险活动(O'Connor & Paunonen, 2007)。然而,在某些文化背景下,宜人性高的个体可能会为了集体利益而参与特定的冒险行为。例如,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高宜人性个体更愿意为家庭或团队的利益承担风险(Zuckerman et al., 1979)。这表明,宜人性与冒险行为的关系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调节。

2.5.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与冒险行为

尽责性反映了个体对任务的责任感、自律性以及计划性。高尽责性个体通常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风险规避倾向。研究表明,尽责性与冒险行为之间通常呈负相关关系(Zuckerman et al., 2000)。高尽责性个体在面对风险时更倾向于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潜在的负面后果。他们通常会避免参与无计划、不确定的冒险活动,而更倾向于选择安全、可控的行为模式(Whiteside & Lynam, 2001)。例如,一项针对投资行为的研究发现,高尽责性个体在金融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的投资策略,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Fischer et al., 2011)。这表明,尽责性不仅影响个体的冒险行为倾向,还可能通过风险规避行为促进长期稳定(de Pillis & Reardon, 2013)。

3. 实证研究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人格特质在冒险行为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人格维度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冒险行为倾向,尤其是在面对高风险活动时,外向性、开放性、神经质和尽责性等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Nunnally, 1978)。

3.1. 外向性与冒险行为

外向性是五大人格模型中的核心维度之一,它反映了个体的社交性、活跃性和寻求刺激的倾向(Kline, 2000)。研究表明,外向性高的人群通常表现出较高的冒险行为倾向,特别是在探索新鲜事物和寻求社交刺激的情境下。例如,Zuckerman (2007)的研究指出,外向性与寻求新奇刺激和冒险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cCrae & Costa, 2008)。他进一步通过行为基因学方法揭示,外向性高的个体在寻求冒险时更容易感到兴奋,并倾向于进行高风险行为,如极限运动和冒险性投资(Zuckerman, 2007)。

此外,Whiteside 和 Lynam (2001)的研究发现,外向性与冲动性和多重风险行为之间也有明显的关系。在实验中,外向性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赌博和其他形式的冲动性冒险活动(Srivastava, John, Gosling, & Potter, 2003)。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外向性不仅仅是社交和情感方面的特质,它还深刻影响个体如何处理高风险的决策情境。

Srivastava et al. (2003)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外向性在成年早期对冒险行为有长期影响,尤其是在新兴成人阶段,外向性与冒险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尤为显著(Eysenck & Eysenck, 1985)。这意味着,外向性可能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发挥了持续的作用,影响其冒险行为的发生。

3.2. 神经质与冒险行为

神经质是描述个体情绪稳定性和易怒、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一个人格维度。虽然直观上看,神经质与冒险行为似乎呈负相关关系,但一些研究却揭示了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个体如何管理负面情绪时。例

如, Fischer et al. (2011)的研究表明,神经质高的个体在面临压力和不确定性时,可能会表现出较强的情绪反应,从而导致他们通过冒险行为来缓解这些负面情绪(Whiteside & Lynam, 2001)。这种负面情绪的管理可能是他们参与冒险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

与此同时, McCrae 和 Costa (2004)的研究表明,神经质对冒险行为的抑制作用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在情绪调节机制较弱的情况下,神经质高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做出冲动的冒险决策,例如参与赌博、酗酒或其他高风险行为(Cloninger et al., 2018)。

在另一个相关实验中, Brebner John (2001)通过对多个跨文化样本的分析发现,神经质高的个体在面对冲突或压力时,往往更容易依赖高风险的应对策略,包括冒险行为或情绪驱动的决策(Brebner, 2001)。这表明,虽然神经质通常与回避高风险情境的倾向相关,但在某些情境下,它也可能促进冒险行为的发生。

3.3. 开放性与冒险行为

开放性指的是个体对新经验、新想法和新事物的接受度。多项研究发现,开放性高的人群往往表现出较高的冒险行为倾向。McCrae 和 Costa (2008)指出,开放性与冒险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尤其是在寻求刺激和探索未知的行为方面(Zuckerman, Eysenck, & Eysenck, 1978)。开放性高的个体倾向于参与那些新颖、复杂和不确定的活动,如极限运动、冒险旅行或非传统职业选择(Zuckerman et al., 1978)。

Srivastava et al. (2003)的研究发现,开放性高的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和青年期更倾向于表现出高风险的探索行为,这种倾向在成年后逐渐减弱(DeYoung et al., 2007)。他们进一步指出,开放性不仅与冒险行为的发生相关,还与个体对冒险行为结果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例如,高开放性个体通常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来看待冒险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从而减少冒险中的负面感受(O'Connor & Paunonen, 2007)。

在另一个跨文化研究中, Zuckerman et al. (1978)发现,尽管不同文化对冒险行为的接受度不同,但开放性高的个体在所有文化背景下,都表现出较高的冒险行为倾向。这表明,开放性作为一个人格维度,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对冒险行为的倾向具有普遍的影响(McCrae & Costa, 2004)。

3.4. 宜人性与冒险行为

宜人性高的个体通常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意识和关注他人利益的倾向,因而他们在决策时可能更加保守,尤其是在涉及到群体利益的情境中。Josef et al. (2016)的研究表明,宜人性与冒险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宜人性的人倾向于避免那些可能引起冲突或不和的高风险活动,例如赌博或极限运动。

然而,部分研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宜人性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例如, Zuckerman (1978)通过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比较发现,宜人性较高的人群在某些文化背景下,尤其是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文化中,可能会参与到某些被认为是“冒险”的行为,例如为他人冒险或帮助他人克服困难。这表明,宜人性与冒险行为的关系可能会受到文化和社会情境的调节。

3.5. 尽责性与冒险行为

尽责性是指个体的自律性、责任感和对细节的关注。高尽责性的人通常更倾向于遵循规则、规避风险,并对行为的后果保持高度关注。研究表明,尽责性与冒险行为之间通常呈负相关关系。例如, Cooper, Agocha, Sheldon (2010)的研究发现,尽责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谨慎和保守的决策策略,从而避免那些可能带来不确定后果的高风险活动。

在一项跨国研究中, Kitayama (2017)发现,尽责性对冒险行为的抑制作用不仅仅在西方国家得到验证,在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趋势。高尽责性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那些有明确规则和较低风险的活动。这表明,

尽责性与冒险行为的负相关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那些强调责任、规划和风险管理的情境中。

3.6. 总结

从多项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等人格特质在冒险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不同人格特质的作用机制不同，但它们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体是否会参与高风险活动。此外，文化背景、情境因素以及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也会对人格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深入探讨这些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生物学机制、跨文化比较和情境调节方面的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人格特质如何影响冒险行为。

4. 生物学机制分析

生物学机制在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Cloninger et al., 1993)。随着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研究的进展，我们对冒险行为背后的生物学基础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近年来，行为遗传学与神经决策模型的结合为解释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视角(Weidlich, 2020)。以下从遗传学、大脑结构与功能、神经递质及激素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

4.1. 遗传学因素

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有关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早期的双生子研究发现，个体的风险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遗传因素相关。Cloninger (2018)在《The Psychobiology and Genetics of Human Personality》中系统阐述了人格特质的遗传基础，提出多巴胺能系统的基因多态性(如 DRD4 基因)不仅与外向性和开放性特质相关，还可能通过调节奖赏敏感性影响个体的冒险倾向。这一观点在近年来通过量子决策理论(Quantum Decision Theory, QDT)与气球模拟风险任务(BART)的结合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Weidlich (2020)发现，携带特定 DRD4 变体的个体在 BART 任务中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偏好，且其决策模式可通过 QDT 模型量化预测——即遗传特质通过调节多巴胺信号强度，影响个体对即时奖赏与长期风险的权衡。

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行为研究为遗传与冒险行为的关联提供了补充证据。DiLalla 等人(2020)指出，具有“黑暗三联征”(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亚临床精神病态)的个体更易参与高风险反社会行为(如暴力、网络霸凌)，而此类人格特质的遗传性部分源于多巴胺转运体基因(DAT1)与 5-羟色胺受体基因(5-HTTLPR)的交互作用。这提示冒险行为可能通过不同遗传通路表达，具体表现取决于人格特质的类型(如反社会型 vs. 探索型)。

4.2. 大脑结构与功能

新近研究进一步表明，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的功能连接模式可能中介人格特质对冒险行为的影响。例如，Rimfeld 等人(2018)发现，高尽责性个体的前额叶-边缘系统功能连接增强，这与其在 BART 任务中更谨慎的风险规避策略相关。此外，Jang 与 Choi (2020)在人格障碍遗传学综述中指出，边缘型人格特质者的杏仁核过度激活与其冲动性冒险行为密切相关(Barlow, 2002)，而此类神经活动差异可能受 COMT 基因(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 Val158Met 多态性的调控。

4.3. 神经递质的作用

神经递质在调节冒险行为的生物学机制中占据核心地位。多巴胺作为奖赏系统的关键递质，其活动水平与冒险行为倾向密切相关(Adriani et al., 2009)。Cloninger (2018)的整合模型进一步提出，多巴胺能系统的个体差异不仅影响外向性特质，还可能通过调节“行为激活系统”(BAS)的敏感性，促使个体在高风险

险情境中更关注潜在奖赏而非威胁信号。例如,携带 DRD4-7R 等位基因的个体在赌博任务中表现出更强的伏隔核激活和对损失的钝化反应(Weidlich, 2020)。

另一方面,血清素系统的功能异常与冲动性冒险行为显著相关。DiLalla 等人(2020)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5-HTTLPR 短等位基因携带者的血清素再摄取效率降低,可能导致前额叶抑制控制功能减弱,从而增加反社会型冒险行为的发生率。这一机制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因其前额叶发育尚未成熟,血清素能调控失衡易引发高风险行为(如物质滥用、危险驾驶)。

激素水平对冒险行为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睾酮作为与竞争性和 dominance 行为相关的激素,其水平升高可增强个体在博弈任务中的冒险倾向(Stanton et al., 2011)。近期研究扩展了这一结论,发现睾酮对冒险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人格特异性——仅在高外向性或低宜人性个体中显著(Rimfeld et al., 2018)。此外,皮质醇作为应激激素,其急性升高可能通过抑制前额叶功能,促使个体在压力情境下做出更冲动的风险决策(DiLalla et al., 2020)。

4.4. 行为遗传学与风险决策模型

传统生物学机制研究多聚焦单一因素(如基因或神经递质)的作用,而新兴的跨学科模型开始整合遗传、神经与认知维度。例如,Weidlich (2020)提出的 QDT-BART 框架将 DRD4 基因多态性、多巴胺信号强度与量子决策概率模型相结合,成功预测了不同人格特质个体在动态风险任务中的行为模式(如高开放性个体更易在信息不确定时“量子跃迁”至高风险选项)。此类模型为理解“基因-脑-行为”通路提供了量化工具,也凸显了人格特质在生物学机制中的调制作用。

4.5. 综述

从最新的生物学研究来看,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大脑结构与功能、神经递质和激素等多方面生物学机制的调节。多巴胺、血清素、睾酮和皮质醇等生物标志物在个体的冒险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大脑的奖励系统、前额叶皮层以及杏仁核等区域则在调节冒险行为中起到关键作用。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深化这些机制的探索,并进一步验证它们在不同情境、文化背景以及个体差异中的作用。

5. 跨文化视角与未来研究方向

文化差异

跨文化研究表明,冒险行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冒险行为通常受到家庭和社区的严格约束,冒险行为往往被视为与个人主义、自私以及社会规范的冲突。相比之下,个人主义文化中,冒险行为往往被理解为人格独立、自由和自我实现的体现。例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冒险行为与自由、探索和个体的自我实现紧密相连;而在日本等集体主义国家,冒险行为可能被视为不负责任、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Joseph & Zhang, 2021)。这表明,文化背景在塑造个体冒险行为的态度和倾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6. 未来研究方向

1) 神经生物学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神经影像学技术,探讨不同人格维度在大脑中的神经基础。例如,研究不同人格特质如外向性、神经质或开放性与特定脑区的激活模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格特质如何通过大脑的生理反应和活动模式影响冒险行为的产生(Swann et al., 2002)。这种神经生物学视角将为我们提供更深入的生物学机制理解。

2) 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不同情境下的风险感知和决策过程对冒险行为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个体在压力情境下做出的冒险决策可能与常规情境下的行为有所不同。在高压环境下，个体可能表现出更高的冲动性或更高的冒险倾向，导致决策模式发生变化。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实验研究或自然情境研究，深入探讨情境变量对冒险行为的调节作用(Pickering & Gray, 1999)。

3) 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跨文化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冒险行为的多样性。特别是，如何通过文化差异来解释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某些文化可能更强调群体的稳定与安全，因此个体冒险行为的容忍度较低；而另一些文化则可能将冒险视为探索 and 创新的必要条件。通过跨文化研究，我们可以揭示文化因素如何塑造个体的冒险行为，并影响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之间的互动(Brebner, 2001)。

7. 结论

人格特质在人类冒险行为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外向性、开放性和神经质等人格特质的不同组合能够预测个体在面对风险和挑战时的行为倾向和决策。尽管现有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关于人格与冒险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支持，但在跨文化、情境因素和生物学机制等方面仍有许多待解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人格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丰富现有理论体系。这将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冒险行为的多维度特征，以及人格如何在不同背景下对冒险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Adriani, W., Boyer, F., Gioiosa, L., Macrì, S., Dreyer, J. L., & Laviola, G. (2009). Increased Impulsive Behavior and Risk Proneness Following Lentivirus-Mediated Dopamine Transporter Over-Expression in Rats' Nucleus Accumbens. *Behavioural Neuroscience*, 159, 47-58. <https://doi.org/10.1016/j.neuroscience.2008.11.042>
- Barlow, D. H. (2002). *Anxiety and Its Disorders: The Nature and Treatment of Anxiety and Panic*. The Guilford Press.
- Brebner, J. (2001). Personality and Stress Cop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1, 317-327.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138-0](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138-0)
- Cloninger, C. R. (2018). The Psychobiology and Genetics of Human Person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131, S5. <https://doi.org/10.1016/j.ijpsycho.2018.07.017>
- Cloninger, C. R., Svrakic, D. M., & Przybeck, T. R. (1993). A Psychobiological Model of 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0, 975-990. <https://doi.org/10.1001/archpsyc.1993.01820240059008>
- Cooper, M. L., Agocha, V. B., & Sheldon, M. S. (2010). A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on Risky Behaviors: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and Affect Regulatory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 1059-1088. <https://doi.org/10.1111/1467-6494.00126>
- De Fruyt, F., Mervielde, I., Hoekstra, H. A., & Rolland, J. (2000). Assessing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with the NEO PI-R. *Assessment*, 7, 329-345. <https://doi.org/10.1177/107319110000700403>
- de Pillis, E., & Reardon, K. K. (2013).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ersuasive Message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12, 382-396. <https://doi.org/10.1108/13620430710756762>
- DeYoung, C. G., Quilty, L. C., & Peterson, J. B. (2007). Between Facets and Domains: 10 Aspects of the Big F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880-89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3.5.880>
- DiLalla, L. F., Diaz, E., & Jamnik, M. R. (2020). Toward the Dark Side: Temperament, Personality, and Genetics Related to Antisocial Behaviors. In K. J. Saudino, & J. M. Ganiban (eds.), *Behavior Genetics of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pp. 193-213).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0716-0933-0_7
- Eysenck, H. J., & Eysenck, M. W. (1985).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 Natural Science Approach*. Plenum Press.
- Fischer, P., Greitemeyer, T., Kastenmüller, A., Vogrincic, C., & Sauer, A. (2011). The Effects of Risk-Glorifying Media Exposure on Risk-Positive Cognitions, Emotions, and Behavio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367-390. <https://doi.org/10.1037/a0022267>
- Jang, K. L., & Choi, F. (2020). Issu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Personality Disorder Genetics. In C. W. Lejuez, & K. L. Gratz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pp. 29-3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333931.007>

- Josef, A. K., Richter, D., Samanez-Larkin, G. R., Wagner, G. G., Hertwig, R., & Mata, R. (2016).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Risk-Taking Propensity across the Adult Life Sp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1, 430-450.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090>
- Joseph, E. D., & Zhang, D. C. (2021). Personality Profile of Risk-Takers.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2, 194-203. <https://doi.org/10.1027/1614-0001/a000346>
- Kitayama, S. (201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ttitudes and Social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2, 357-360.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077>
- Kline, P. (2000).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Routledge.
- Lauriola, M., & Levin, I. P. (2001). Personality Traits and Risky Decision-Making in a Controlled Experimental Task: An Exploratory Stud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1, 215-226.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130-6](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130-6)
- McCrae, R. R., & Costa, P. T. (2004). A Contemplated Revision of the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6, 587-596.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3\)00118-1](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3)00118-1)
- McCrae, R. R., & Costa, P. T. (2008). The Five-Factor Theory of Personality.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3, 159-181.
- Neal, A., Yeo, G., Koy, A., & Xiao, T. (2012). Predicting the Form and Direction of Work Role Performance from the Big 5 Model of Personality Trait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3, 175-192. <https://doi.org/10.1002/job.742>
- Nicholson, N., Soane, E., Fenton-O'Creevy, M., & Willman, P. (2006). Personality and Domain-Specific Risk Taking.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8, 157-176. <https://doi.org/10.1080/1366987032000123856>
- 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McGraw-Hill.
- O'Connor, M. C., & Paunonen, S. V. (2007). Big Five Personality Predictors of Post-Secondary Academic Performa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3, 971-990.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7.03.017>
- Pickering, A. D., & Gray, J. A. (1999). The Neuroscience of Personality. In L. A. Pervin, & O. P. Joh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 277-299). Guilford Press.
- Rimfeld, K., Kovas, Y., Dale, P. S., & Plomin, R. (2018). True Grit and Genetics: Predict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from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1, 780-789.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089>
- Robins, R. W., Fraley, R. C., & Krueger, R. F. (2007).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Guilford Press.
- Srivastava, S., John, O. P., Gosling, S. D., & Potter, J. (2003).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in Early and Middle Adulthood: Set Like Plaster or Persistent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1041-105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4.5.1041>
- Stanton, S. J., Liening, S. H., & Schultheiss, O. C. (2011). Testosteron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Risk Taking in the Iowa Gambling Task. *Hormones & Behavior*, 59, 252-256. <https://doi.org/10.1016/j.yhbeh.2010.12.003>
- Swann, A. C., Bjork, J. M., Moeller, F. G., & Dougherty, D. M. (2002). Two Models of Impulsivity: Relationship to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sychopathology. *Biological Psychiatry*, 51, 988-994. [https://doi.org/10.1016/s0006-3223\(01\)01357-9](https://doi.org/10.1016/s0006-3223(01)01357-9)
- Weidlich, V. A. (2020). Personality and Genetics Correlations to Risk-Taking Using Quantum Decision Theory in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s. *Cureus*, 12, e9923. <https://doi.org/10.7759/cureus.9923>
- Whiteside, S. P., & Lynam, D. R. (2001). The Five Factor Model and Impulsivity: Using a Structural Model of Personality to Understand Impuls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0, 669-689.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064-7](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064-7)
- Yates, J. F. (1992). *Risk-Taking Behavior*. John Wiley & Sons.
- Zuckerman, M. (1979). *Sensation Seeking: Beyond the Optimal Level of Arousal*. Erlbaum Associates.
- Zuckerman, M. (2007). Sensation Seeking and Risky Behavior. In W. J. Livesley, & R. Larstone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Disorders* (pp. 373-395). John Wiley & Sons.
- Zuckerman, M., & Kuhlman, D. M. (2000). Personality and Risk-Taking: Common Bisocial Fact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 999-1029. <https://doi.org/10.1111/1467-6494.00124>
- Zuckerman, M., Eysenck, S. B., & Eysenck, H. J. (1978). Sensation Seeking in England and America: Cross-Cultural, Age, and Sex Comparis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6, 139-149.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46.1.139>